

从《恳亲会》到《倪焕之》

——浅论叶圣陶教育文学观念

王诗琪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叶圣陶写于1921年的独幕戏《恳亲会》与1928年写作的小说《倪焕之》在故事内容、结构以及教育思想方面存在极大重合，两篇文本存在互文性。围绕《恳亲会》到《倪焕之》第11—14章的农场改造问题讨论形成和打破隔膜和阻碍的形式问题，研究教育作为改造社会方法的可行性，在“五四”到“五卅”的背景下建立教育与革命之间的另一层联系。

关键词：叶圣陶；《恳亲会》；《倪焕之》；教育小说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2.031

引言

叶圣陶在创作于1921年的独幕戏剧《恳亲会》里，描写了甬直第五高等小学的校长黄隶青、教师毕宜等改革者，主张兴办并改造农场，通过劳动教育的方式实行新式教育，达到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目的；然而由于改造农场要铲除荒地上的坟墓，与乡人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对于乡人们被“敲竹杠的编辑”煽动而起的敌意，黄、邵等人并未迁就妥协，而是试图以开办恳亲会（即家长会）的方式，把他们请来，指点给他们看，真诚地告诉他们农作是什么意思。即使遭受了仅朱信卿一人前来与会的窘迫，却以他为可亲，呈现出昂扬积极的思想风貌。

《恳亲会》带有“五四”问题剧的特征，也并非叶圣陶的代表作品，不过上述故事情节，后来又又被叶圣陶移用到其名作、“教育-革命”小说《倪焕之》之中，成为第11—14章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推断，对叶圣陶的写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情节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叶圣陶及其作品中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

与《恳亲会》相似，《倪焕之》同样描写了倪焕之与蒋冰如两位新式教育人士的教育改革措施，他们同样采用了兴办农场项目的改革措施，并且同样，这个项目由于需迁移坟墓而受到了乡民们的阻碍。为了达成在实践中教导学生能力的“开源教育”目标，他们雇佣工人修整校外荒地，迁移荒地上的坟墓以开辟农场，然而，这样的举动却惹起了乡间民众的流言，渐发展成一种“恐惧、愤恨、敌视的感情”。在村中土豪蒋士镛的有意引导下，形成了一股攻击学校的风潮，逼迫学校的教师们“迁就社会”。有所不同的是，小说最终，倪焕之

他们不得不与蒋士镛交好和谈，使他得到实际的好处，从而平息了反对的声浪。

可见，由于故事模式、背景事件及教育思想的共同性，两个文本得以构筑出链接的桥梁，呈现出独特的互文关系，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恳亲会》看作一个特定的“前文本”，将其纳入对《倪焕之》的解读中去。本文即以这种思路，来分析研读由《恳亲会》到《倪焕之》，叶圣陶内在教育思想的呈现。

一、恳亲会的消失

叶圣陶对同一题材的两次不同书写中，保留了原有的改造农场的教育实践，以及迁移坟墓时受到乡人阻碍的情节，却又改变了教育改革者们最终处理阻碍的方式。《恳亲会》以“恳亲会”的模式进行家庭和学校的沟通，希望以此打破“隔膜”，《倪焕之》中“恳亲会”的模式却消失了，不再以此来解决。而这其中，一个关键词始终在两篇文本中重复出现，即“隔膜”。

《恳亲会》中，“隔膜”最先出现于秦、毕二人的对话之中。毕宜提到现今参加恳亲会的人不见一个，肯来的人也一定不会多，这是因为“彼此之间有了隔膜的缘故”，秦佩瑜则认为这隔膜恐怕只会愈结愈厚。对于反对浪潮的兴起，这些小学校的教育者们不约而同体会到了与家长存在的隔膜，并以隔膜的存在作为事件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出于这一共识，小学校长黄隶青才决定召开恳亲会，将使儿童从事农作，开办农场的理论缘由说与他们听，获得理解，使他们一同觉醒。在《倪焕之》中，算学教师同样提到隔膜：“隔膜，反感，再加上对灾害的顾虑，自然把我们看作异类，群起而攻

了。”隔膜的存在成为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改变社会的阻碍。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悬亲会》隔膜两端的是学校和家长，通过“悬亲会”将学校与社会建立联系，通过学校教育带动家庭教育，从而达到传播新式思想，改变社会的目的；《倪焕之》已认识到社会存在的弊病无法单靠教育完成，从而转向处理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问题如能解决，则家庭教育问题也就随之解决。“悬亲会”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这种方式也就在《倪焕之》中消失了。

悬亲会的形式，也即是今天所广泛应用的家长会。在晚清时期私塾废除，新式教育的体制借由国民政府的政令逐步建立起来，扎根各地村间乡里的时期，其开办无疑有教育意义。在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下，私塾老师所面向的学生群体通常人数较少，在部分情况中可以达到一对一的个别授课方式，这使得教育方面的权责几乎完全移交给学校的老师。将儿童送入私塾学校之后，学生的原生家庭便与教育脱钩，专注于对孩子经济上的支持，也就不直接参与到教育之中。于是，私塾教育便在学校教育的范畴之内额外承担了家庭教育的部分。

而在私塾学校废除的情况下，传统教育形式被新式的教育体制所打破、取代。教员们秉持着西式的教育思想，准确地划分着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分野，家庭教育重新被学校划分出去，回到家庭的正位。但是，家长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改变，正如茶馆里小胡子般朴素的教育思想：认为“学生好比泥土，只要把泥土按进模型，拿出来便是个优良的制造品”，旧的由学校大包大揽式教育自然最为符合他们只要学生学习一些学问知识，将来占个好地位的教育期望，是个“毫无遗憾的模型”了，但是却不能塑造出独立健全的人，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学校所期望形成的教育机制与家长印象中依然拥有的教育方式在这一方面发生了断层及错位。学校希望家长携带着缺失已久的家庭教育重回儿童教育的整体之中，以家校互动的良性方式在家长的助力下达成培育新人的教育理想，家长却对于自己的教育义务毫无自觉，甚至于同学校产生了妨碍。在黄隶青等人的认知中，只要开办悬亲会，家庭教育便会打破隔膜，站到学校等进步者的一边，一同以觉醒的身份推动儿童的理想教育。悬亲会固然是学校用以沟通家庭教育的一次尝试，然而却未必适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在《悬亲会》中将隔膜

“窄化为教师与家庭之间的隔膜，而忽略了背后的社会原因，这也是为何最终只有一人前来的原因”。

《倪焕之》中所描写的教育改革者们，同样试图进行教育的改革，然而不同于《悬亲会》的是，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形势，以更为贴合现实的改革者视角细致分析了隔膜所产生的深层原因：“这根据着一种教育理想，原是不错的。但社会的见识追随不上，以为我们是胡闹。隔膜，反感，就是从这里产生的。”经由此种观点，旧有的学校与家庭之间的隔膜就被上升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整个社会大众之间的隔膜，从而使得教育的探讨转向了更为宏大的“转移社会”与“迁就社会”之间的路线矛盾，为之后倪焕之的思想进步以及叶圣陶本人的思想深化提供了基础。

二、新教育，新生活：叶圣陶的教育思想及改革措施

在《悬亲会》和《倪焕之》两篇小说中，知识分子致力于以教育改造人、改造乡镇，并消解他们同整个社会大众的隔膜，达到改变整个社会的目标。教育者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再由学校影响到家庭，使整个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这样的观点在叶圣陶的多篇教育小说以及教育杂文中都出现，并具体讨论了教育作为改造社会方法的具体措施。

叶圣陶曾在小说《乐园》中叙述了一对父母想要为孩子寻找理想的学校而未果的故事，他们见到的第一所学校教师教学状态并不理想，第二所学校教室昏暗，寻不到教师。第三所学校孩子粗野愚钝。最后，父母这样发问：“因为迈儿的乐园还不知在哪里呢。”除了《乐园》，还有《义儿》《祖母的心》《风潮》《城中》《搭班子》几篇同样可以反映叶圣陶对当时家庭、教师教育的批评和反思，这种反思在他的教育杂文中得到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讨论。

叶圣陶所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于学生的培养。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中，他提到要激起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处理事物的能力。从教师方面来说，只有教师拥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才能以此来熏陶小学生。然而当今小学教师反而抱着“继承道统”“宣扬圣道”的笼统缥缈的人生观去教育小学生，无法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对于教学方法，他提出现在的教师只顾按照课本讲授，让学生进行记忆，而不顺应他们的天性，让他们形成处置未来的动

力和方法。例如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中提出要做到“知行合一”，以实践为主要导向，让学生根据兴趣，自主探索的教育模式需要更加宽阔的场地和多元化的教育环境。同时，他认为教育环境与教师的使用方法同等重要，既要有校园、运动场、工作场、会堂、图书馆、博物室等等设备，还要有集会、工作、运动、旅行、考察种种活动。由此可见，叶圣陶的教育思想是以改造社会为根本目标，并不断丰富变化，适应时代发展的。

三、《倪焕之》中从“转移社会”到“迁就社会”的转变

在《倪焕之》中，倪焕之提出了关键的问题：“我们这个学校到底要转移社会还是要迁就社会？如果要转移社会，那么我们认为不错而社会不了解的，就该抱定宗旨做去，让社会终于了解，如果要迁就社会，那当然，凡是社会不了解的只好不做，一切都该遵从社会的意见。”《恳亲会》中教师们提出要靠“十分的真诚”来感化乡民，对于那些“射来的冷箭”，教师们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倪焕之》中，蒋冰如等人的做法并非致力于“打破隔膜”，而是试图绕开“隔膜”，走一条迂曲的小径，达到最终的结果。由此可见，从《恳亲会》到《倪焕之》，教育改革者们解决问题的态度已经发生了“由转移社会到迁就社会”的转变，面对多种力量的阻碍，作者已经不再仅仅是以梦想和激情来寄希望于问题的解决，而是对几种不同力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制定了切实的应对方案。

在《恳亲会》中消息通过《乡报》进行大范围传播，根本原因在于编辑存心借此敲诈。教师们并未向编辑低头。而在《倪焕之》中变为蒋士镛让乡民们认为墓地的地皮属于他，让学校无权对地皮进行改造。面对蒋士镛的发难，校长蒋冰如逐渐趋向于曲线救国，为了达到最终的教育目的，拣平稳便当的道路走。最终，他们抄送了意见书并将其分发给乡民，且没有破除原来的坟墓。对于蒋士镛，教师们决定给予他好处，使他不再干扰农场的改造。

可以看出，这种“迁就社会”的方式虽然解决了农场改造的问题，却造成了原始路径偏移，并没有打破隔膜，解决问题。然而这样的结果也就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问题，这也就是上文提到倪焕之不满、阑珊的原因。

四、“五四”到“五卅”：走向革命的教育

叶圣陶1921年所作的《恳亲会》与1928年连载的

《倪焕之》之所以出现教育改造路线和方法的变化，究其根本原因，是时代车轮转动所致。《恳亲会》是根据叶圣陶在甬直镇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的经历所作，记录了新思想在教育基层的传播与实践。在《恳亲会》发表后，叶圣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落潮以后弥漫在知识界中间的彷徨苦闷，逐渐开始对专谈教育产生怀疑，感到寂寞。就如倪焕之所产生的怀疑一样，他逐渐认识到自己远未完成从“狭隘的模拟实践”到“广阔的真实实践”的突破。于是，他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对社会、经济的大变革之中，他发现了教育的更深的根柢：

“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教育应该与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同步发生并互相促进发展。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挫败之中的倪焕之朦胧看到了这种方向成功的可能性，由此萌生了从教育转向社会革新的想法。

当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学生运动发生时，前往上海女子学校任教的倪焕之心中的理想被点燃为实际的行动。从五四到五卅，革命运动的地域范围、阶级范围扩大化，由城市深入至乡村，更深层的群众力量被发动，革命潮流愈加汹涌，形成不可逆转之势。“五卅”发生后，倪焕之自觉将教育理论走向与社会实际结合为时代的必然选择。可见，此时的倪焕之已彻底完成了对社会革命与教育的关系的构想：把前者当作后者的重要补充实践甚至更为基本的先导条件；从实践方面来说，即以“革命的教育者”这一特殊身份，主动地勾连融通革命与教育，为教育创造社会基础、为革命寻找坚实依托。

在小说结尾部分，革新运动已深入乡镇，但却受到重重阻碍：新措施被旧势力蒋士彪利用，成为权力博弈的游戏；革新的群体多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实践经验不足，容易陷入激进的泥淖。最终倪焕之病终，蒋冰如回到保守主义道路，想要成立“新村”，“每隔几天在里边开一回讲，招集四近的人来听，这样的结局体现了叶圣陶新的批判和反思，其教育文学观念就是在这样的批判与反思中不断发展的。

参考文献

- [1]高金林，叶圣陶甬直文集[M]，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03，394.
- [2]商叶圣陶，叶圣陶文集 第三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0，223.
- [3]叶圣陶，叶圣陶文集 第三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0，232.